新时期小说中的苦难叙事

张宏○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本书运用文本解读的方式，以中国当代小说文本里的苦难叙事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化”的研究方法，探询新时期以来，不同小说文本在现代性叙事脉络中所呈现出来的思想意识变化，及其折射出来的含混、暧昧、复杂和变动的时代特性，并进一步解读出当代社会和思想的变迁以及文学的处境变化。

上架建议：当代文学

ISBN 978-7-81127-763-0

9 787811 277630 >

定价：35.00元

新时期小说中的苦难叙事





张宏◯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小说中的苦难叙事/张宏著．－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1

ISBN 978－7－81127－763－0

Ⅰ.新… Ⅱ.张… Ⅲ.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Ⅳ.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5041 号

新时期小说中的苦难叙事

作　　者　张　宏

责任编辑　秋　实

责任印制　范明懿

封面设计　大鹏工作室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70×970 毫米　1/16

印　　张　12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81127－763－0/I·763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ST

绪论 /1

第一章 在苦难中拯救灵魂 /23

第一节 灵与肉 /24

第二节 轻与重 /42

第三节 生与死 /52

小结 /58

第二章 道德理想主义者的“苦难”叙事 /64

第一节 苦难与审美 /65

第二节 苦难与理想 /75

第三节 苦难与宗教 /84

小结 /98

第三章 “融入野地”与“清洁血缘” /103

第一节 洼狸镇 /103

第二节 鲦鲅村 /113

第三节 葡萄园 /124

小结 /13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四章　生存苦难的个体言说 /139
第一节　苦难与残疾 /139
第二节　反抗宿命 /149
第三节　虚与实 /154
小结 /167

结语 /175
参考文献 /182
后记 /186

绪 论

一

苦难叙事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所谓苦难，从狭义的个体角度，可以理解为现实苦难（艰难和不幸的遭遇）和精神苦难（例如痛苦）；从广义的社会学角度，则可以理解为社会苦难（贫穷、动荡、战乱等）和大地苦难（自然、生态苦难）；而从哲学角度理解，苦难则可以被看做是人存在着的本质困境和永无止境的痛苦遭遇，因此必然具有“深刻的悲剧精神”。所以，叔本华说：“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着。”①“人生在整个根性上便已经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人生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形态繁多的痛苦”。② 如何完成对人生痛苦、苦难的拯救与解脱，是一切宗教、哲学寻求救赎学说的动力。实际上，这种救赎学说并不能真正消除苦难，只不过是试图对苦难进行释义与转化，让苦难变得有意义和有必要，从而在人的精神上实现超越。因此宗教对苦难的救赎总是对灵魂和意义的拯救。耶稣替代所有受苦的人们接受受难与惩罚，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一行为把

①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27页。

②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43页。

爱和牺牲联系起来，让身体的凌辱和惩罚转化成精神上的殉难与牺牲。苦难因此获得了祝福的含义。舍勒就说过：基督“出于爱，自由地替人受难牺牲的思想，照亮了痛苦的事实，除非人们以这种牺牲理念去把握受苦，也许才可能接近一种更深刻的受苦的神正论。”①佛教对苦难的看法更加自然化，它认为既然一切生老病死都不可避免，那么众生皆苦就是一个永恒轮回的自然现象，因此它主张禁欲来拯救苦难。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宗教的牺牲和殉难理念，主张局部和低级的价值、利益应该为整体和高级的价值、利益进行奉献和牺牲。或者说为了普遍和彻底地消除苦难，需要具体和局部地承受苦难。阿多尔诺与霍克海默因此对牺牲个体的革命宗旨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只要有人被作为牺牲品，只要牺牲包含了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对立，客观上牺牲中就包含了欺诈。”②在对待苦难的理解上，宗教和革命的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赋予为了精神信仰而受难者以美德，从而也就赋予其在道德上的优越地位。甚至，在许多时候，受难都成为具有理想和道德的象征。但是，这种受难者的美德在工具理性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受到了挑战。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人不再认同苦难的积极意义。他们奉行“优胜劣汰”的自由竞争乃至“丛林法则”，而苦难则成为了贫困、落后和无能的结果。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风行全球的今天，对理想与道德的渴望逐渐为对欲望与享乐的追求所替代。及时行乐和追求感官快乐与刺激成为新的行为原则。不过，这种享乐也许是现代人精神苦难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因为无法摆脱现代文明身穿统一制服的宿命，而理想的丧失和精神的犬儒化又增加了现世的虚无感，现代人的精神困境让现代性叙事的方向变得暧昧不明。

---

① 舍勒：《爱的秩序》，林克等译，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224 页。

②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6 页。

当然，所有的苦难感受，都是以人的视阈，以人的主体意识为出发点的，因此它最终势必是人的精神层面的反映。这种反映也表现在文学层面。同时，经过文学的审美化和抽象化处理，对苦难的叙述往往会和文学家们特有的人文关怀和对苦难的深度思考联系起来，同时为作品镀上了深深的悲剧色彩，而这种悲剧的指向几乎最终都是对于社会、民族文化乃至人性的反思。因此，曹文轩认为："人存在着，其本质必然是悲剧性的；人面对自然，面对社会，面对自己，都要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甚至是不可克服的困境……文学的基本使命之一就是在这样一些较高的社会学层面上或是在哲学层面上来表现人的永无止境的痛苦以及在痛苦中获得的至高无上的悲剧性快感。"①显然，在他看来，文学里的悲剧，经常是和人性本身、人本困境以及人的深度痛苦相关联的，也就是和具有终极性的人的苦难相关联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对苦难的叙述中，读者就经常可以感受到这种深沉的、具有终极色彩的悲悯情怀。而卡夫卡、加缪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可以被看做是对存在以及其痛苦的表述与溯源，并且让读者明白，那种对存在苦难的麻木、漠视与不知觉，才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对苦难的反映就是对人存在本质和生活本质的反映。正如陈晓明所言："苦难一直是文学艺术表现的生活的本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学艺术对生活的把握具有现代性意义。苦难是历史叙事的本质，而历史叙事则是苦难存在的形式。对苦难的叙事构成了现代性叙事的最基本形式之一。"②因此，"苦难在文学艺术表现的情感类型中，从来都占据优先的等级，它包含着人类精神所有的坚实力量。苦难是一种总体性的情感，是终极的价值关怀，说到底，它就是

① 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0页。

② 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3页。

人类历史和生活的本质。”①

二

对苦难的叙述是文学对生活本质的一种呈现，但是文学中对苦难的叙述从来不是单纯的，而是带有复杂的对创作背景和时代特性的投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文学里的苦难叙事进行考察必须和对文学本身的考察联系在一起。在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产生不过二百多年。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文学的任务在于代表体现在艺术中的能量和价值准则对社会进行改造，具有深刻的社会含义、政治含义和哲学含义。因此，他认为，文学是不可能被客观地下定义的；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读者眼里，文学和文学性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所以他说：“有人认为文学就是一系列具有可靠的、不会改变价值的作品，明显地具备某些共有的内在特征，其实这样的文学根本不存在。”②伊格尔顿还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起源、定义和发展脉络做了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式的分析。他指出：“在十八世纪，文学不仅仅是‘体现’某种社会价值准则；它同时又是进一步巩固和传播这些价值准则的重要工具。”③而进入19世纪，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才开始真正流行。这个时候，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同社会权力问题有着最为密切联系的思想意识。

伊格尔顿对文学的看法和他的老师雷蒙德·威廉斯的看法有着相似的方向，尽管后者总体的思想要温柔和内敛许多。威廉斯指出：“从一般意义上说，文学显然是一种社会活动，而其价值似乎正在于作者获得了某种活力，这种活力显现出来而且直接用于文学方式的讨

① 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

②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③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论。这种活力存在于一种大于文学范围，存在于作家和现实关系的全部复杂之中。"①

当代批评认为，文学的种种社会承载功能和发展演变脉络与现代性叙事有关，与民族国家的建构以及个人的"自我"构造有关。事实上，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当中，如果我们把现代性表述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它最早就是靠文学完成这种想象的。而在福柯看来，自启蒙时期以来，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和自我的主体性确认和身份认同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文学来完成这种意识形态信息规训和内在化的过程。因此，这里有必要再提一下已经被学者们探讨多次的意识形态问题，对它的界定和阐释同对文学的界定和阐释一样复杂、持久和充满变化。伊格尔顿认为："为我们的事实陈述提供信息和基石的隐蔽的价值结构，就是所谓'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粗略说来，是指我们的说话和信仰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权力机构和权力关系联结的方式。"②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里对西方学者关于意识形态的各种界定以及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关系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他认为，现象本身具有神秘化作用，是一种幻觉，而意识形态则具有哈贝马斯所谓的"合法化"功能，它通过"说服"、"训练"，让人们相信某种社会制度的合法性，而这个"极为复杂的合法化过程，似乎总是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基本作用之一"。③杰姆逊认为这个过程就是葛兰西所谓的"政治霸权"，而如果要质疑合法化现象后面的本质，让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差距呈现出来，则要进行意识形态分析。杰姆逊发现，对意识形态的经典性认识和十八世纪的启蒙有关，而自从阿尔都

①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 页。

②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8 页。

③ 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4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塞以来，出现了对意识形态的崭新认识。阿尔都塞给意识形态的定义是："对个体与其现实存在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整体感是一种想象性功能，并且与自我认同联系在一起。杰姆逊分析说："为了维持延续某一实践，人们需要自己的意识形态。这样，意识形态便成为对群体实践的肯定；而实践中每一个人都是有意识形态的。"因此，"意识形态从来就不是个人的，而是群体的"。[①] 所以，在阿尔都塞和杰姆逊看来，个人通过对现实存在的意识形态想象性功能，从而达到自我认同的过程其实就是"自我"的被构造、规训和内在化的过程。

正是在这里杰姆逊找到了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结合部，作为叙事的文化蕴涵着作为观念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虽然是观念性的东西，但是却处处体现在行为实践上面。"文化从来就不是哲学性的，文化其实是讲故事。观念性的东西能取得的效果是很弱的，而文化中的叙事却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小说是叙事，电影是叙事，甚至广告也是叙事，也含有小故事。"[②]这里，作为文化构成的小说、电影、广告都是意识形态不同形式的非观念性载体。而作为非观念性的、形式的意识形态在杰姆逊的另外一本著作《政治无意识》中被更加明确地提了出来："对文类的形式探讨必须坚持，直到通过从根本上历史化使所说的'本质'、'精神'、'世界观'被揭示为一种意识形态素，就是说，一种历史地决定的观念综合体或对立的社会阶级的集体话语因素的综合体，这种综合体可以以各种形式表现自己，可能以一种'价值体系'或'哲学概念'的形式，也可以以一种主叙述、一种个人或集体叙述幻

①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6 页。

②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6 页。

想的形式。"[①]这里,形式就是内容和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内容编码的结果。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对小说里的意识形态素进行了具体分析。他指出:"这些意识形态素是原材料,承袭的叙事范式,作为过程的小说就作用于这些范式之上,并将其改变为属于不同秩序的文本。"[②]而作为小说基本主题之一的苦难叙事,也在文本中为读者留下了可以进行意识形态素辨析的痕迹。杰姆逊以乔治·吉辛叙述英国下层苦难的小说《冥界》为例,将它和同样叙述英国下层苦难的作家狄更斯的伤感叙事范式,以及欧仁·苏的情节剧范式做了比较。他评论说:"这两种范式,伤感和情节剧,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可以看做是两个不同的(但并不相互排斥的)叙事策略,可以说是19世纪中产阶级对下层社会加以道德化的软硬两手。这两手在《冥界》这种书中都留下了印记,因此它才得到广泛的阅读,但不是由于它关于维多利亚时代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纪实性信息,而是将其作为这两种叙事范式的见证,中产阶级何以用这两种范式组织他们关于那些贫民窟问题和'解决办法'的幻想的,何以用这些'办法'解决、控制或抑制由工业劳动阶级和城市破落无产阶级的存在而引起的明显的阶级焦虑的。"[③]

当然,在杰姆逊看来,这种编码和叙事更多是以"政治无意识"为潜在动力的。杰姆逊对文化叙事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分析和新历史主义学者对修辞、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分析非常相似。修辞本身就是一种叙事。[④] 而福柯对话语实践和权力关系的考察从另外一个方面为叙事

---

①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②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页。

③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

④ 参见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做了说明。在《知识考古学》里，重要的不是话语的对错，而是分析它的权力基础，以及分析它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发生究竟意味着什么。西方学者们对叙事的种种分析无疑增加了我们对文学叙事，特别是小说叙事的复杂性认识。小说作为文学叙事之一种，不仅是讲故事，也是一种话语实践和修辞。正如叙事是"现代"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也是现代性叙事的结果。小说通过叙事把个人的故事编织进集体的、国家和民族的甚至整个人类的现代性整体叙事之中。当然，文学（小说）之所以能够承担这种功能，也和自己独特的品质有关。按照伊格尔顿的分析，文学之所以适合于达到意识形态的目的，主要是通过感情与经验发挥作用的。伊格尔顿说："'经验'不仅仅是思想意识最易生根的土壤，而且，当它以文学形式出现时，它本身就是一种替代性的自我满足。"①文学通过感情与经验给人们提供"想象的真实"，从而在提供安慰的同时也表述了自己的道德思想意识。正如伊格尔顿描述的："在文学作品里，这些道德准则是通过活龙活现的、毋庸置疑的事实介绍给'已经感受到的经验的'，因此较之其他形式，也就更加生动，更加富有戏剧性；有鉴于此，文学也就绝不仅仅是道德思想的侍女：就像 F. R. 利维斯后来在他的作品里非常明确指出的那样，它本身就是现代的道德思想意识。"②

显然，在上述西方学者看来，文学无疑是一种承载种种社会功能的精神实践活动，是对民族国家、主体认同等现代性叙事的关键词语进行表征、想象、建构的一种有效策略。那么，同样地，文学里对苦难的叙述虽然是对生活本质的一种呈现，但是这种呈现从来不是完全客观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作者和时代的思想意识和意识形态的编

①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3 页。
②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4 页。

码过程。[①] 而考察苦难叙述里潜在的各种思想意识痕迹，也是进行文学研究的一项有趣和必要的工作。

三

"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在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全力从西方文化与思想中寻觅解救中国的良方，文学也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汲取与借鉴西方文化思想并进行传播的手段之一。不少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倡导汲取文学中的思想拯救民族的命运，其中以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的倡导最有影响。在他们的倡导下，"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家对以文学形式来进行各种思想意识表述爆发出极大的热情，在他们的创作中洋溢着对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进步的渴望，而中国文化保守势力对国民性格的压抑以及造成的社会苦难也让他们焦虑和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代作家大多转向西方文化寻求解救，并且注重其中蕴涵的博爱思想、人道精神、救赎色彩、人格意味，以此来否定中国文化中的封建伦理、等级观念、宿命思想、奴隶性格。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性关怀的缺乏和对社会苦难的漠视深恶痛绝，因此，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纷纷在创作中营构着充满博爱色彩的温馨世界。

在中国，考察现代文学的兴起，我们可以发现它和"人性"、"启蒙"、"革命"、"解放"、"自由"这些现代性叙事中的关键词联系紧密，甚至也可以清晰地找到它和民族性认同、国民性批判、民族解放和诸

① 实际上，就如卡夫卡、加缪等具有存在主义倾向的作家，尽管他们的作品是对存在本身及其痛苦的表述与溯源，但是仍然可以从文本里的"苦难"叙述读出表征现代性叙事中人性异化、精神麻木等时代和社会征候的复杂内涵。而所谓的各种"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我们知道它们也都不是完全"现实"的。

多现代性进程要素内在关联的历史脉络。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甚至认为,"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完成想象的。并且指出18世纪兴起的两种想象方式——小说和报纸——为作为共同体的民族想象提供了技术手段。[①]但是在中国问题上,另外一名美国学者杜赞奇并不完全认同他的看法,认为早在西方现代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就有类似于"民族"的想象了;对中国而言,崭新的事物不是"民族"这个概念,而是西方的民族国家体系。不过,这种对民族的认识是受制于漫长却停滞的中华帝国的封建化历史叙事,为一种被同化了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所限制的。因此,当西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想伴随着大炮、洋教士和鸦片传入中国,这片古老的静土才从千年一梦中翻然醒悟,在苦难与动荡中发出"东方醒狮"般愤怒的呐喊。停滞的历史时间在这一刻开始运动,而传统文人和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精英也纷纷用各自的纸张和笔墨替代"匕首和投枪",加入"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宏大叙事中。[②]

显然,一个可见的事实是,无论在中国现代先驱者那里,还是在西方汉学者看来,"苦难"在近代中国向现代性进程的靠拢中,在促进国人以西方列强为他者,从而实现对国家和民族的界定和认同过程中,都起了无法回避的清醒剂作用。因此对苦难的叙述也无疑成为现代文学里最重要和最沉重的部分。翻开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对苦难的叙述触目皆是。这一方面为我们呈现了创作时期风云变幻、国家忧患的历史独特性背景,另一方面也为后人的重新解读和分析提供了复杂性、含混性和多层性。解读和分析这些作品里的苦难叙事,考察附加与承载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目的,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显得十分必要。

① 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② 参见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新文学肇始，就打出了重新估价传统文化价值和追求人性解放自由的两面旗帜。这种文化思潮也表现在文学作品以及对苦难的叙述上。而反抗传统糟粕一面的艰难和争取新文化道德的不易所造成的苦难与迷惘，不仅表现在文本里，甚至也表现在对文本的命名上，例如《呐喊》、《彷徨》、《沉沦》、《生死场》等。

在鲁迅的许多作品里，小说叙事总是和国民性批判联系在一起的，是杰姆逊意义上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而这种寓言是以对苦难的叙述为基础的。《狂人日记》里的“救救孩子”，《祝福》里鲁镇人对祥林嫂苦难遭遇的漠视，《孔乙己》里主人公生不如死却无人问津的悲惨遭遇，《药》里普通民众对遇难革命者的无知和冷淡，都反映了作者对愚昧国民悲惨而麻木的生活的关注，对国民性格“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和同情。正如张旭东指出的：“历史在鲁迅那里是以寓言的面目出现的，……在鲁迅这里，历史的停滞通过寓言变成了历史运动的革命性前提。”①

在郁达夫的作品里，苦难叙述更多地和个人的内心深处联系起来，和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以及对解放自由的向往联系起来，同时也就和对国家、民族解放和富强的期盼联系起来。从作家气质和文学风格上来说，郁达夫都是一个因为国家不幸而失去精神家园、悲愤惆怅的流浪诗人。正如他在作品里呼喊的那样：

>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
>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②

① 张旭东：《批评的踪迹》，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260～261 页。

② 郁达夫：《郁达夫自叙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8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